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文学艺术（第一辑）

A hist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比较文学史

〔法〕洛里哀 (F. Lotte) 著 傅东华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Press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文学艺术（第一辑）

A hist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比较文学史

「法」洛里哀（F. Lollée）著 傅东华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文学史/李天纲主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 文学艺术)

ISBN 978-7-5520-1873-8

I. ①比… II. ①李… III. ①比较文学—文学史 IV. ①I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2203号

比较文学史

主 编: 李天纲

编 纂: 赵 炬

责任编辑: 唐云松

特约编辑: 陈宁宁

封面设计: 清 风

策 划: 赵 炬

执 行: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 笑 然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p.org.cn

排 版: 上海三联读者服务合作公司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00毫米 1/16开

印 张: 23.75

字 数: 310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1873-8/I.235

定价: 114.00元(精装)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二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

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榫，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

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要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去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请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

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间，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北大『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形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细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2016年3月20日，于阳光新景寓所

「法」洛裏哀 (H. Loire) 著 傅東華 譯

比較文學史

中華民國二十年四月初版

譯序

「比較文學史」這個名詞，驟然看時，很容易解做「比較的文學史」，其實應該解做「比較文學的歷史」，「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的義蘊，也不僅如詞面。

一八八六年，英國的波斯奈脫教授 (Prof. H. M. Posnett) 始用這名詞名他的著作。他揭櫫他這著作的宗旨是在指出「社會進化上某種稍為固定的原則，藉以綜合文學上興衰進退的事實。」

稍後，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蓋雷 (C. M. Gayley) 發起「比較文學研究會」(a societ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其宣言有云：——

「因為缺乏系統的努力，關於文學的型類運動，主題等等之比較的研究，迄今未有適當的進行。倘叫各個人單獨去努力，那未即使要從各國文學中去搜集為說明一種文學類型的特質所必需的材料，殆亦不可能。如今六家合力的時候到了。在這推議中的「比較文學」(或文學進化)研究會」裏，各個會員須就他所特別熟悉的一種文學類型式文學運動去作專門的研究……」(見 *The Dial* 一八九四年八月號。)

由這兩例看來，可見所謂「比較文學」就是由系統的——或統合的——方法見出的文學這與後事莫爾頓 (R. G. Moulton) 所謂「世界文學」(world literature) 名雖不同，實際則一自。

方法，文學史的性質顯然經過一種基本的變化，或者竟說這種方法，就是近代文學史的基礎也無不可。固在這種方法未被應用於文學史之先，（一）文學史只能是國別的，而統合全世界的文學的歷史及說明世界文學主潮相互影響的歷史無從做起；（二）文學史只能是傳記的，批判的，而文學現象的前因後果無從說明。故比較文學的概念之構成和應用，不能不說是近代文學研究上——特別是文學史研究上——的一大進步。

近代文學研究所以能有這樣的大進步，我們溯本追源，不能不歸功於一般實證主義的——特別是進化論的——思想家。這些思想家曾經證明社會上一切現象——文學也在內——都決不是單獨的存在，而必有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唯有這個依存關係的原則的發見，文學史家纔得放棄從前那種流水賬式的作法，而曉得從許多散漫的材料裏去理出一個頭緒來。這些思想家當中，有一個雖然不曾直接說到文學而卻對於文學研究發生極大影響的，就是達爾文；試想那個近代的文學理論者能輕蔑視他的進化觀念呢？其次對於文學曾經直接宣述意見而亦發生很大影響的，當推孔德（Comte）、勃克爾（Buckle）和斯賓塞爾（H. Spencer）三個人。他們的體系雖不完全相同，卻都招示我們以文學和環境（自然的及社會的）間的密切關係。同時及以後的文學批評家和文學史家受了他們的影響，或竟把他們的體系毫無變動地應用起來，如波斯奈脫教授之應用斯賓塞爾，或者把他們的體系略略修改一下，作為自己的體系，而也實地應用起來，如泰音（Taine）之作英國文學史，布輪退爾（Brunetière）之作文學史上類型的進化（L'évolution des genres dans l'histoire de la

rature) 拉都叔 (Lebournan) 之作各人種的文學進化 (L'évolution littéraire dans les diversités humaines) 總之這一派的一或寧說近代的——文學史家的傾向是不外試用一種一般的概念來統一切紛亂的現象。那末我們應該曉得這部比較文學史的作者洛里哀 (Lolier) 也是代表這種傾向的，因為他自己曾有這樣的明白宣言：——

「文學史的職務是在尋溯種種知識運動的潮流，說明種種潮流的影響，並譯述種種努力的形勢，備作彼此比較的單位或資料而已。」

但是比較文學史所以能與泰音的英國文學史差不多享有同等的地位，則並非單靠它能代表這種傾向。因為能依順這種正當的傾向與否，固然是估量近代文學史的一個重要標準，但除這個標準之外，仍舊還須顧到「一般歷史」的標準。所謂一般歷史的標準，簡括言之，就是不以觀察的事實遷就某種現成的前提的原則，觀察的事實裏面臨時去發見原則。許多歷史家所以失敗就因忽視這個標準的緣故，即如波斯奈脫教授的文學，也因把斯賓塞爾的學說固執得太厲害，先人的見解太深，事實的觀察太淺，以致不免犯着牽強附會——至少是粗率——的通病。所以蓋雷和司各脫 (F. N. Scott) 在他們合著的文學批評的方法與材料 (Methods and Materials of Literary Criticism) 裏批評他道：——

「我們對於波斯奈脫的方法無論認為它的價值如何，總須把希臘和拉丁的文學讀了，藉以證實或批

在「部落制度之殘試存」一章中所得的結論，或把英國作家的作品讀了，藉以補充他說明「國民文學的性質」那種粗率的梗概。」（頁二五〇）

這話的意思，無非說文學史家的結論，必須與文學史的史實相符，而要判定一個文學史家的信用如何，也不外拿實在的史實與他的結論去相核對一法。而事實上，這樣的不相符，乃是近代急進的文學史家最容易犯的一種毛病。原來紀述和說明的差別。本是劃開文學史上舊的方法和新的方法的差別；舊的方法單有紀述而無說明，已不復能壓足近代人事事要求理解的心理。新的方法，則省略了紀述而加上說明，但是省略紀述並不就是省略觀察，特不過不單把直接觀察的結果紀錄下來，卻把由觀察而得的見解紀錄下來；無觀察，說明是無從產生的。急進的文學史家為求速效起見，往往自己先憑空構成一個體系，或先從別人採用一種學說，便要使一切現象都受它的範圍。若果這種體系或學說是健全的，又若應用時非常審慎，不肯扭曲事實或抹殺事實以遷就學說，卻是確曾對於事實的全部都加細密的觀察，而發見它們與所假定的學說絕無抵觸的，那也未嘗不可獲得滿意的結果。但若那體系或學說的本身已不健全，而應用時又因範圍廣大而不得不粗率，那末就沒有不失敗的。這樣的失敗，就連這派文學史家的老師泰音，自己也還不免。泰音之用「種族」、「環境」和「時代」三種因素來說明文學，似乎是頗撲不破的，但是晚近的文學論者已有人否認它們是基本的因素了。見（伊科維茲的唯物史觀的文學論第一部第二章。）他如布輪退爾，於泰音的三種因素之外再加上「個性」一因素，卻也沒有更多的成功。我

們並不是反對這種因素的採用，（因為如不採用這個，系統的說明便不可能，）也不是主張採用什麼較基本的因素以代替第二義的因素，（如馬克思主義的文學論者主張以經濟的因素代替其他一切被認為非基本的因素。）不；我們所反對的，是未曾對事實全部作細密觀察之前，便預先拿定幾個因素，來說明它們的那種辦法。上面已經說過，說明是基於觀察上的，那末用以說明的因素果能說明所觀察的事實的全部而無抵觸，那便算是有效。至於所觀察的事實範圍擴大了，原有的因素已不復能說明它了，那也不能消取這些因素在原有範圍以內的效力。所以泰音舉出的三項，若果能說明他所處理範圍——英國文學——以內的事實，且確是由觀察這些事實而得的結果，那末在那範圍以內是完全有效的。後來人若不把他自己所處理範圍以內的事實——譬如中國文學或其他文學——先作一種實地的通盤觀察，卻便把泰音的三個因素，或布輪退爾的四個因素，乃至勃克爾流文化說，馬克思的經濟史觀，囫圇地粗率地應用上去，那就是絕大的錯誤。

而且，文學史家所處理的範圍愈廣，他的流於粗率的機會必愈多，那也是不待說的，故文學史家的第一在於度量自己的能力和時間容他所得處理的範圍能有多大；若果他的能力和時間只容他對於某一一時代的作家和作品細加觀察，那末他最好不要冒昧嘗試世界的全部文學。因為文學史畢竟與其他的同，未經實地觀察的史料總是有危險的。

由上述幾層，我們對於洛里哀此作的功罪已略略可論。他能從最古時代直到現在的世界上一角

文學織屑無遺地用不過繁重的篇幅統統都收攝起來，使成一種很自然的有機組織，這樣的魄力是我們不能不佩服的。我們讀過全書之後，雖然不能便獲得關於世界文學的充分知識，卻可獲得一種整個的印象，一幅明瞭的地圖，至少對於世界上比較著名的作品總都能指出它在這地圖上的經緯度數來，這又是其他同性質的著作難可比擬的。特別在他最後一篇結論裏，我們覺得他的眼光非常廣遠，見地非常公允，態度非常大方，斷不是那種效忠於某一特定流派或特定主義的文學史家或文學理論家強勉強得來的。又他用以說明文學現象的因素雖然大體上是泰晉的，卻是並不顯出硬栽的形跡。這也是他的一個優點。

但是許多人讀了這書之後，總都要有一種印象，就是要覺得它好像不是一部文學史，卻是一部文化史。這是確乎難免的。我們推求它所以要給人這種印象的原因，實在就他所處理的範圍太大。因為像他這樣包羅廣泛的文學史，對於所列舉的文學作品當然不能逐一都會加以觀察，故對於這些作品的本身的批評當然不得不從略，同時關於這些作品的背景的敘述，則不得不增多。又所包羅的範圍既廣，倘若作者的眼光不側重在各民族文學的文化背景上，也實在無法可以將它們統一起來。故做這樣偉大的工作，確乎需要非常偉大的魄力；本書作者的魄力原也不能不算大，但終不免犯着顧此失彼的毛病。讀者試將他和勃蘭提斯（Brandt）去比較一下。勃蘭提斯以他那樣的博學卓識，卻也只敢在十九世紀歐洲文學主潮裏處理半個世紀的文學，而且還只以英、法、德三國為限，所以成績畢竟好得多。

譯書的人本不應該批評原書的好壞，但因論文學史的方法不覺信筆及之，這是破了譯序的通例的，要請讀者原諒。

本書的譯稿曾承唐擘黃先生替我校看一過，應在這裏表示謝意。又本書的英、日譯本都是周啓明先生借給我的，因輾轉托人校看的緣故，竟將兩譯本完全失落了，現在兩譯本都已絕板無法可以償還，只得在此表示萬分的歉意。

傅東華，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五日，於上海。